

市场转型的双重心理后果

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助理、博士、副教授)

中国持续 30 多年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对世界还是在本土都堪称“伟大的转折”,其间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震荡都无一疏漏地传导至每个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在改变他们物质世界的同时对其精神和心理世界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集体意识——“中国体验”成为一种宏大的精神景观。^[1]

更具叠加效应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夹杂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等等一系列变迁,身陷其中的所有个体都同时经历着双重洗礼,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心理后果:顺势或逆势、认同或否定、积极或消极、变革或停滞、理性或感性、西方或东方等等。选择并承受其中任何一种社会心态或行为方式均各有利弊,而大多数人都难以游离于二元性、双轨制之外。这样的双重心理历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边际性及反思性至今仍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未来选择,并且经由市场转型对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持续作用,在社会底层群体、中产阶层和精英群体中形成了差异化的双重心理效应。

首先,最需要关照的是参与这场轰轰烈烈

市场变革的最大群体——劳工阶层,或曰底层群体、弱势群体,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市场转型中所经受的双重挤压被市场转型理论研究大大忽视,他们 30 多年的转型体验没有“传承”、也没有“再生”,而是“断裂”和“边际”。对城市下岗工人而言,市场转型之迅猛使得他们来不及做任何技能和心理上的准备,而承接他们的社区、地方政府或社会同样也没有做好完全准备,于是带着难以割舍的单位依赖和政府依赖,他们被毫不留情地从单位、从“铁饭碗”式的工作中抽离,在市场这一沙漏中从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一下子沉入社会底层,直至现在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断裂中找平衡。同样,由市场转型及中国城乡二元分隔共同催生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带着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及无限向往奔向城市,但城市只对他们有劳务需求,却不供给公民身份应有的基本保障,他们主动离乡背井换来的仍然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的生活。这两类社会底层的代表群体在市场转型中没有获得较好的生活际遇,因而形成失落的底层心态。此外,他们都曾是大锅饭或平均原则的受益者,也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影响,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强

烈的不公平感便油然而生,与之伴生的还有愤怒、嫉妒、相对剥夺感,这极易构成对优势阶层的仇视。另一方面,即便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获得再分配优势的社会底层群体非常清楚变迁的不可逆转,也并没有大规模地拿起“弱者的武器”,但他们在挣扎的同时仍抱有希望,希望自身最终能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希望社会能给予更宽泛的社会保障,或希望通过代际更替来摆脱困境。

其次,市场转型理论的乐观派较早地观察到极具社会稳定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孕育,这一方面源于以倪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市场的理想期待^{[2] (P54)},也即市场对打破权威、鼓励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会导致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精英地位的衰落,产生新的分层机制和新的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的成员并非来自旧体制下的精英;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以陆学艺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实证研究^[3],亦即一批有知识、有技能、有胆略的城市精英在市场转型的所有双重选择中都获得了正向的能量,他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对理性、现代、教育、竞争、公平等的认同帮助他们在市场转型中顺流而上,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一阶层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对物质丰裕之后的精神世界有更高的追求,事实上他们不仅具有转型期普遍的焦虑、浮躁、患得患失的消极心态,同时他们面对转型社会常见的冲突、失序以及两极分化等现象并没有足够的包容和忍耐之心。他们希冀市场转型尽可能彻底,或能直接带来理想的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但其因自身资本累积所获得的优越感也被随之而来对社会整体的失望所消减。如此的双重心理反应直接影响这一阶层对社会的持续认同和贡献。

再者,作为魏昂德“政府即厂商”^[4]、林南“地方市场社会主义”^{[5] (P101)}、周雪光“政治与市场的共变”^{[6] (P105)}模型中获益最多的权贵阶层,他们既是昔日的精英,且在不完全市场转型中仍然享有足够的资源分配权。理论上他们通过“再分配权力的商品化”继续保有上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比其他阶层有更多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然而,中国语境下的市场转型区别于东欧的“休克疗法”、西欧的完全市场化所

体现出的双重路径。权贵阶层对市场的操控,也就是说市场转型的双轨制直接为权贵阶层的地位维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这一阶层的矛盾心态生成进行了有效注解:一方面,他们横跨权力场和市场两大场域,并将其打通让双边资源互为转换,这引起社会公愤,所谓“拼爹”、“官二代”之说对这一阶层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的资本要想合法化并非易事,同时社会中下层群体对市场转型的应得原则、公平原则有越来越高的期待,这给权贵阶层也带来相当的不安全感。所谓“高处不胜寒”,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市场转型为权贵阶层实现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共通,让其获得身处社会顶层的优越感,那么同时也将其推上了风险之巅,失足落下悬崖的已不鲜见,因而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应该也是市场转型后期权贵阶层的普遍心态及行事作风。

从市场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让转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盛世,在物质层面极大地提升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分化及文化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理性、竞争、创新等价值取向,与拜金、享乐、虚无的思潮并存;中华文化所传承的和谐、共荣、互敬的美德,与冲突、利己、仇视的社会心态共处。市场转型所引发的双重心理后果正将一元、大同的总体性社会引向多元、分化的个体性社会,社会也因为各个阶层体验着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而出现“阶层定型化”的趋势。因此无论从上至下的制度安排还是自下而上的精神救赎,都应将市场转型引向更为良性的发展轨道,如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分享转型成果才可预期。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6).
- [2]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 [3] 陆学艺.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 [4] Walder, Andrew G.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

tional Economic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5] Lin, Na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1995.

[6] Zhou, Xueguang. Reply: Beyond the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责任编辑 陈雁洁